



辞旧迎新·节日记忆

敖日格勒在城里工作,他在牧区区长,家住陈巴尔虎旗以西的海拉尔河边,与我是好友。那年腊月二十三,他约我去他家祭火,另说让我见识一下“乌日根达贵的铁炉子”,这个铁炉子的来历我听敖日格勒说起过,便乐得与他前往。

北方少数民族对火都有着格外的崇敬,在酷冷的蒙古高原,一日也离不开火。没有火,人类根本无法生存,只能冻饿而死。所以他们尊火为神,并将火神与家族的兴旺紧紧相连,所谓薪火相传,包括“蒙古”这个族名,其意也为“永恒之火”。而小年祭火,风俗大体与汉族人相同,都是为辞旧迎新。说着话,我两驱车已过西乌珠尔,从左侧下公路,然后顺着茫茫大雪原上的两道车辙一直走,差不多快望到海拉尔河时,就是敖日格勒的家了。最先来迎接我们的是两条牛犊子一般高的大黑狗,瓮声瓮气地围着车子叫,敖日格勒摇窗吆喝了两声,黑狗马上摇起了尾巴,兴奋地奔回家里报信。敖日格勒家有老额吉、哥哥吉日木图、嫂子巴勒玛和两个小侄女。为了祭火仪式,一家人已经忙碌大半天了,一边打扫房屋,一边准备祭品。

喝过几碗奶茶,敖日格勒把我领到砖瓦房旁的蒙古包,地中间的炉火烧得正旺。他指了指通红的炉灶,说:“这就是‘乌日根达贵的铁炉子’,你看炉门上写的什么汉字。”我俯下身看清了“德兴永”三个繁体汉字。

“我查过资料,德兴永白铁铺建于1926年,是来自山东掖县的一个叫杜福林的铁匠在海拉尔开的铺子,”敖日格勒说,“那时候草原上刚有这种洋铁皮制成的炉子,曾祖父为了买这个炉子,还出了一段远近皆知的笑话呢!”

原来,敖日格勒的曾祖父叫乌日根达贵,那时,他正年轻,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容易接受新事物。一天,乌日根达贵去海拉尔赶集时,经人介绍,在二道街的德兴永白铁铺用一匹驢马换回了这个带烟囱的铁炉

傍晚,冬娇子从麦菜岭的背面朝我家走来,选声呼唤着我母亲的名字。我冲出家门,看见她披着夕阳快步下坡,意气风发的样子,仿佛从高处降落的一个天使。

我知道,要打切糖了。在童年的记忆里,岁末最期待的莫过于置办年货,打切糖便是其中极隆重的一件事,要提前和冬娇子约定时间。村里会打切糖的师傅不多,腊月是她最忙碌的时节,要先爆好家打,买好白糖,备好柴火、草纸、石灰等必需品。

对于大人来说,这是辞旧迎新必不可少的仪式,是春节期间待客的礼数和家庭的脸面;对于孩子而言,更多是味蕾的满足和事件本身带来的热闹和喜悦。一年到头,我们罕有零食,能尝到的甜头实在屈指可数,唯一可以饕餮的时候只有过年,可想而知,打切糖在孩子心中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母亲迎上前去,接过冬娇子手中提着的工具,一脚跨进了厨房。不用瞧,我也能猜到,无外乎一个四四方方的木架子、一柄沉甸甸的木槌、一根圆溜溜的油茶木棍、一把轻薄而锋利的切菜刀、一把结实又光滑的长木尺,年年围着锅台转悠,我早已看了很多遍。这时的冬娇子就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女将军,开始发号施令:“烧火,熬糖。”那闪着银光的白花花的糖粒儿,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偶尔用指头蘸一点放进嘴里舔一舔,已是极快活的事。可是这一天,那么多的白糖,被一股脑儿地倒进大铁锅里,不能不令我感叹过年的神奇。我趁机捻了一小撮入口,母亲并不责怪我,她总是在这个时候变得格外慈爱宽容起来。

而冬娇子脾气不大好,喜欢叱骂小孩,嫌碍手碍脚。我自小心性敏感,受不得半点委屈,不过对冬娇子的苛责,我基本采取无视或原谅的态度。谁让她会打切糖呢?谁让她一连多天脚不点地东家打完西家打呢?如今想来,哥哥就比我聪明多了,大人干活的时候离得远远的,少挨了许多骂。等到可以吃的时候,他立即闻声而动,饕餮一番,再夹带一些,不知不觉间就溜进了卧室。

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总是安排在晚上打切糖。昏黄的灯光下,灶膛里柴火熊熊



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同的少数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各具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节日习俗,记录着阖家团聚的庄重时刻,承载着沉甸甸的团圆情怀。新年伊始,本专刊特推出“辞旧迎新·节日记忆”散文专题,分享不同民族作家记忆中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节日习俗。

祭火

□海勒根那(蒙古族)

子,满心欢喜拉回家里,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撇胡子瞪眼睛骂他败家子,更不让他把这个带着“长脖子”的怪东西搬进蒙古包。那个年代,草地牧人用的都是三个腿或者四个腿的图拉嘎(火撵子),没有烟囱,直接在里边烧牛粪、羊粪,烟从套脑天窗往外排。遇到雨季或者没有风的天气,烟气排放不通畅,蒙古包里都是浓烟,不多日,所有家当陈设都覆盖一层黑乎乎的烟灰,久而久之,人的皮肤都成了黑灰色。可老人们沿袭的是古老的旧传统,在图拉嘎里烧火,没有炉壁的遮挡,牧人们随时能感受到火的燃烧、大小和熄灭,包括怎样变成火炭和灰烬。这个时候,人和火神始终是在一起的,没有任何间隔,而乌日根达贵拿回的铁炉子可不一样。父亲责骂乌日根达贵:“你想把火神关进牢笼里吗?还是想让它长脖子把火神吞了,再从那个窟窿(指烟囱)像放屁一样放到外面去吗?我的糊涂儿子,你怎么能用一匹驢马换回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被父亲责骂一顿后,乌日根达贵只能将铁炉子放在蒙古包外,让它在雨雪里生锈,并一度成了曾祖父家门前的标志。那以后,牧人们打过曾祖父家,就会指着那个铁家伙说:“看,那就是‘乌日根达贵的铁炉子’。”以至于传为牧人们的笑话。

当然,后来,牧民们的思想进步了,铁炉子有一天终于大摇大摆地走进蒙古包,并且随着时代变迁,蒙古铁炉子也在不断改进,灶火神在牧民家里越烧越旺了。

“嘿,乌日根达贵的铁炉子!”我感慨地说。“不过,族人到现在祭火还得用三个腿的图拉嘎,”敖日格勒笑着说:“可能把火神关在牢笼里……”

那天,敖日格勒家的祭火是在海拉尔

河岸边举行的,他家离河岸就几百米远。为显庄重,敖日格勒还特意为我找来吉日木图哥哥的崭新蒙古袍和马靴,他与家人更是身着节日盛装。

那是2009年的小年,临近黄昏的时候,冬日的太阳刚好悬在西边的河道里,天空一片紫金色。那河床里原本是玛瑙似的冰冻的河面,因为雪的覆盖变成了一幅飘向远方的白色哈达,像在为祭火增添一份圣洁。靠我们一侧的河岸不高也不矮,却延伸出峡谷一般的壮阔。敖日格勒和哥哥将三条腿的古老图拉嘎置在岸边的至高处,携领家人和我,手捧羊骨叉、奶食、酒等诸多美味,迎着灿烂的金色斜阳。祭火仪式是吉日木图哥哥主持的,随着图拉嘎里的篝火噼啪燃起,吉日木图就用那种短促有力又抑扬顿挫的巴尔虎语调念诵起祭火祝词。不一会儿,篝火愈加升腾了,琥珀色的火焰像懂得主人之意似的,直往天上窜,而烟雾更高过火,像等不及的黑狗,跑去天上报信。此时,一家人便借着火势将祭品投入火中,让火神带到天上去。老额吉围着篝火用木勺往天空泼奶子。“呼——咧——”“呼——咧——”她呼喊起来,“呼——咧——”“呼——咧——”吉日木图哥哥、巴勒玛嫂子、敖日格勒,还有两个孩子一起呼喊起来,声音有老人的,有男人的,有女人的,也有孩子的,“呼——咧——”“呼——咧——”那是人间祈福的声音,传得又高又远,我想,天上的神仙一定能听得见……

须臾,太阳就落到远处,带来了一片静谥祥和的暮霭。那一刻,风徐徐地吹,图拉嘎里只剩下红红的火炭,而火星开始“噼”“噼”地四处飘零,像无数炫着舞姿的萤火虫,又像火的精灵,有的落到河谷和河谷底部挂满雪凇的灌木丛、芦苇荡,有的去更远处寻找星星点点的马群、牛羊群,有的飘到了天上,去迎接星星。星星在深邃的暗紫的夜空里登场了,它们知道敖日格勒家火神的到来,正列队在天上迎接呢!

养得又干爽又酥脆。那个木阁楼和那口大陶瓮,承载了我童年的甜蜜和欢愉。母亲从不锁门,偶尔变戏法似的藏进一包饼干、一袋糖豆,全都化作了我与哥哥舌尖上的享受。哥哥总是比我嗅觉灵敏,他悄悄地爬上阁楼,悄悄地拿两包切糖掖在衣服内,一个人躲起来津津有味地吃。等我发现可以拿的时候,他早已享用过不止一次了。而我每次爬上阁楼,忠实的狗儿芝麻都会紧蹙我的脚后跟,我抱着切糖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用渴盼的无辜的眼神凝视着我,我不忍心让它失望,每每分它几片,看它吃得嘎嘎响,愈加感觉切糖是如此美味。母亲看见了,说我“天一半,地一半”,却并未责怪过我,也许大家早已把芝麻当成家庭成员了。

如今想来,母亲为了满足我们兄妹的口味之欲,真是费尽了心思。她总是就地取材,变着法子将蔬菜或粮食做成零食。晒芋荷干、豆角干、红薯干,炒花生、豆子,炸芋线、糯米酥……那些油啊、糖啊,都是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出来的。

除夕之前,母亲会安排我和哥哥去一趟外婆家,送过年的切糖。不知为何,外婆所在的村庄盛产甘蔗,却没有打切糖的习俗。一根小扁担、两个蛇皮袋、几十包切糖,哥哥挑着担子走在前,我亦步亦趋跟在后,过牛难石、翻石罗岭,艰难步行半天才能抵达外婆家。外婆接过担子,总是心疼地嘘寒问暖。血缘、亲情和爱,就这样穿越山山岭岭,承载着年节礼俗,一代代传递下去。到了正月,家家户户来客人,首先搬上待客桌的就是切糖。大人们并不吃,总是小孩子望着切糖眼睛发亮,迫不及待地拆一包,吃得咔嚓响,嘴角上沾满了糯米花也顾不得擦一下。无论如何,孩子欢喜了,大人就喜上眉梢。

光阴流转到21世纪,当年那个馋嘴的女孩已是镇上的一名教师。当我春节期间重返麦菜岭的时候,忽然发现村里有了人家打切糖了。有一次,我站在屋后的坡岭上看见冬娇子,她佝偻着背,不复从前的精神和威风,想必已打不动切糖。飞人寻常百姓家的,是比切糖好吃得多的各色零食,包装精美的糖果、巧克力、果冻、饼干……简直让人眼花缭乱。等到我女儿这一代,孩子们的嘴巴更刁了,面对琳琅满目的零食,他们会看品牌、颜值,并不胡乱饕餮。甚至,甜味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味蕾,偏要追求些别样的滋味。当然,水果和饮料也是应有尽有。过年和日常,于他们几无区别。

辞旧迎新时,再没有一个母亲为了孩子的零食愁得眉头打结了。味蕾深处,定格下生命中珍存的那份“甜”,以及时代一程程送来的“变”。

按十月太阳历计算,一个月是36天,一年十个月,到了农历十月,也就是秋收之后,彝族年也就来了,这个时期正是阳历十一月,意味着元旦和汉族年也紧随其后。像我们这种特殊家庭,妈妈是汉族、爸爸是彝族,相当于一年要过两个年,彝族年过完紧跟着过汉族年。但无论经济还是精力,过两个年都是很难做到的。如果这样过,一定会过得手忙脚乱。侧重于过汉族年还是过彝族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解决,直到后来奶奶说,一个家庭主要还得听女人指挥,女主内,男主外,一个男人不包容和尊重自己的女人,那他在外面也闹不出什么名堂。妈妈也说,男人没有胸怀就没有天下,只想回家跟老婆争夺得过年,家庭幸福指数就不会太高,两股恩威并施的力量之下,我爸爸对彝族年也越来越不上心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还会在彝族年杀一头小黑猪,问候一下我们祖上那些大小毕摩,后来小黑猪也懒得杀了,什么仪式也没有了,逐渐侧重甚至专门过起了汉族年。但汉族年我们过得也不专业,不到过年那天,就早早地在冬月上旬开始杀猪,正巧挤在彝族年和汉族年中间,似乎是暗示公平公正对待两个节日。谁也不能说哪个年最重要,只能说同等重要。所以我们家的年,大概是在11月开始过,比汉族年多那么几天,比汉族年少那么几天。

可能因为我爸爸主动放弃了庆祝彝族年,导致我格外羡慕可以正经庆祝彝族年的同学。上学的时候,到了彝族年放假,他们无比高兴,而我十分落寞——都怪我们家那时候穷,要不然,两个年都过,才叫热闹。可我无法实现这种愿望,每到彝族年,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就好像我们家的年被什么人偷走,或者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把其中一个年卖掉了。面对彝族年同学的时候,我特别自卑——我们家不怎么过彝族年,导致他们甚至偶尔怀疑我到底算不算彝族,也许只能算半个彝族。不能完全跟彝族同学打成一片,是我小学时期的遗憾。但不妨碍我在这样的心境之下,仍然还有几个要好的彝族同学,他们都对我很包容。其中一个同学是我的表姐,每年我都会跑到她家过年,弥补了我不能在家里过彝族年的缺憾。

彝族的年和汉族的年是极大区别的。彝族的年,年味沉潜在深处,像陈年老酒,历久弥香,所以可能更适合上了年岁的人。它包含着后辈对先祖深邃的敬爱 and 追思,以及对牲畜田产之类的祈福,首先族年看上去少了几分外在的欢闹。小表姐在那个时候,最兴奋的就是杀猪那一天,也许对她来说,只有那一天才算是真正的过年。那天她可以爬到松树上砍些松树枝桠,新鲜的松针还挂在枝条上,我们要拖着沉甸甸的松枝回去,一

欢乐苗年

□龙宁英(苗族)

时序进入冬季,武陵山区就一直阴雨连绵,老人们说,这是要烂冬了。然而没有想到快进冬至节气之际,天气开始放晴,温度上升,气候也变得温暖如春。连台山下,一些早醒的野樱桃花儿,迎着料峭寒风在枝头绽开,一团一团挂在山坡上,把有些萎黄的群峦染出些淡紫色。这是武陵山报春的野樱桃花,她们在告诉人们,过了苗年节,春天真的要来了。

湘西苗族人过苗年,没有统一的固定的日子,一个村子与另一个村子过苗年的时间也不相同,有的选择冬至日,也有选择冬至后的第一个卯日。平时,各家都忙着各自家里的事,难得有时间聚会,等到苗年节到来这天,全寨子男女老少才赶到一起,热热闹闹地聚会,欢庆一年平安度过,同时,也趁着苗年节这天所有人都回来了,大家一起处理一年来遗留下的大小事情——没有解决的纠纷在这天解决,来年要做什么事情也提前规划。

这里的苗年节曾经因为贫穷而中断,现在,民族政策惠及苗乡,精准扶贫、美丽乡村政策的实施,让苗家人日子红火了,湘西苗寨又恢复过苗年的习俗。

梨子寨的苗年节,是冬至日。莲莲姐的亲戚龙春美,家在梨子寨。寨子过苗年这天,她邀请莲莲姐去做客,莲莲姐又邀上我,特意穿上最喜欢的苗装,和她一起去赶热闹,沾沾苗家年的喜气。

梨子寨苗年节庆典场地设在寨口的大坪场上。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庆典开始。只见两排大大的鼓鼓摆好在坪场两边,几十名苗族女同胞穿着节日盛装,用隆重的礼节,敲响了苗年节欢快的迎宾鼓舞。迎宾鼓过后,接着祭祀祖先,跳年鼓,跳年鼓时一人对着大鼓敲击,其余的人男女并排踏着年鼓的节拍绕场跳舞,那轰轰的鼓声、欢乐的节奏、轻快的舞姿,让人开心、让人沉醉。我们插进跳鼓的队伍中,与大家一起手拉手缓缓绕场而行。

此时,坪场中央已经燃起一堆篝火,当庆典走近时,一名后生点燃了旁边的长串鞭炮,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一位老者从大火堆中拨出一堆小火,嘴里念着新年祝词,让参加庆典的人从火堆上跨过。老者边往众人身上撒撒五谷边念着祝词:“苗年苗年,幸福连年!苗年撒下幸福籽,来年五谷发满山!喔嗬嗬——”

庆典结束,围绕篝火载歌载舞的人们退开,就像变魔术一般,庆典坪场变成苗年坪场,许多摊点上摆着苗民们带来销售的各种土特产,琳琅满目。这些土特产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贴着注册过的商标。同样是苗绣,

以开放的胸怀迎接新的生活

□阿微木依萝(彝族)

——编者

些用来祈福,一些另作他用。我们还会在杀猪的头两天到松林里割野蕨,这种东西,一出太阳就晒干了。在高原上,只要不下雨,哪怕是冬天,阳光仍然充足而且热烈,这种气温也只有这个号称“离太阳和月亮最近的地方”才有。杀猪时,用它包裹猪,就像包叫花鸡那样,再点燃,翻滚着将猪毛烧得干干净净,再把火钳子烧红了,钻一钻猪耳朵,将它耳朵里的毛发也一根不剩地燎掉,还要将猪的表皮烧得比黑猪本身更黑,烧出一股可以在旷野中回荡三天三夜的香气,这才算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就是刮猪毛——其实应该说刮猪皮,猪毛早已燎完,用刮子刮一刮,金黄色的肉皮就显露出来。冒着热气的坨坨肉从锅里捞起来,意味着新的一年香气扑鼻地开启。

我有时候会带着汉族年的情感参与到彝族年中,或者说,我还太小,尚且搞不清彝族年需要注意些什么,仅知道吃饭、送礼和回礼的礼仪。有一年,我怂恿表姐在过年那几天也放上几颗鞭炮,她轻轻地训斥了我,说那样是不对的,就算看电视,也不能在过年那几天看打打杀杀的,要安安静静地过年,缅怀先祖,诚心祈福,敬重自然。“你见过自然界这样大吵大闹吗?”她问我。我说:“我见过,风吹山野就咣咣咣咣。”她说:“不对,风吹山野不是咣咣咣,是别的响。”我说:“不管什么响,它总是响的。”她说:“还是不对,那种响不是真正的响,那种响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安静。”她说,她的父辈就是这样告诉她的,自然界所有的响,都是一种更深的安静,所以我们人类应该保持最厚朴的安静。当时,她说得一本正经,但我却听不明白。现在想来,大概也懂了,万物的响都是向着静逸去,所有的旧年都向着蓬勃的新年去。

现在的彝族年更具有包容性,在城市中,我见过彝族对联,他们会把祈福的话写成对联,也贴到门框上。还有各种标识着彝语言的喜庆的字画、彝文书法、彝族年画,以及一些非遗手工藏品,也会贴在洁白的墙壁上。彝族年正在以新的方式进入到新的时代,彝族人正在以开放的胸怀迎接新的生活。

我爸爸的年仿佛是在无声之中胜了我妈妈的年,但要说他们两个的年谁的更重要,确实分不清楚。我喜欢静逸的年,它像勇敢的马,生长在浓雾弥漫的高原山坡,也喜欢热闹的年,红红火火、激荡人心。不管我们过哪一年,都预示着新的生活就在眼前,是对旧年的告辞,也是开启新年的大门,都是怀着更多的期许,朝着更美好的生活去。

却有不同名字——十八洞苗绣、苗翠翠苗绣、七秀坊苗绣;同样是腊味,也分阿雅家腊味、代罐腊味、阿雄腊味;还有金兰蜂蜜、杨记苞谷烧等。给人起名字是为了方便称呼,给植物起名字是为了便于区分,而现在竹子寨这些苗家特产不仅起名,还注册商标,它们的名字不是为了方便,是为了给购买者带来一份信任,是为了给出售者撑起一份自豪。莲莲姐告诉我,梨子寨现在已经有电子商务服务站,寨子里很多人家的土特产品都有商标,通过网上销售,卖得相当红火。

我买了几本十八洞苗绣的布面笔记本、七秀坊苗绣的鼠标垫、苗翠翠苗绣的耳坠。一路走来,家家户户都宾客盈门。因为寨子过苗年,各家的亲戚朋友都赶来了,欢声笑语,菜香满屋。龙春美和母亲已在门口摆出自家出产的苗家米酒“春美屋”,春美把莲莲姐和我往里屋拉,说:“米酒已经温热、腊肉已经蒸香,快进屋来吧,和我们一起过苗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欢欢乐乐过苗年!”

走进春美家门,只见堂屋和地楼都挤满了人,他们都是龙春美的亲戚朋友,特意赶来祝贺苗年的。他们来自附近不同的苗寨,有张刀寨、板栗寨、大龙洞寨的,有龙春美的舅舅、姑妈、姨妈,还有春美阿爸的老虎。火塘里烧着木柴旺火,“嘎嘣嘎嘣”炸响欢快的火花,更添上一种喜气。龙春美和穿戴一新的苗族姐妹围坐火塘边,一群身穿蜀布对襟衣装的后生,围到她们身后,左手搭着同伴的肩膀,右手撑在腿边,以一种苗家尊贵的礼仪开始对歌,他们唱的是《想你变成我寨上的水井》:“我一闭上眼我就想你……”

后生唱了,姑娘们又唱。苗族歌师把暖暖的浓浓的情意融进歌声里,加上曼妙的歌喉,听得人如痴如醉。他们的歌声就像春天的第一缕阳光,照耀白雪皑皑的山岭,冰冻了整个寒冬的积雪正在歌声中融化,臃肿的高原在歌声中层叠有致。慢慢地,山林出现,草地出现,一层层的梯田出现。一窝窝的苗寨出现,一缕缕的炊烟正升起于屋檐青瓦之上,我的耳畔还传来哗啦啦的水声和唧唧呀呀的童谣。

苗岭山寨苗年节,篝火和人心,都那么令人快乐温暖。

